

唐宋八大家列传

柳宗元传

叶树发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柳子厚

文章高古對景於
詩詞精妙獨步騷壇



柳宗元像



柳州柳侯祠 唐长庆二年始建

《唐宋八大家列传》总序

在古代散文史上，唐宋两代是自秦汉之后，出现的又一高峰。这期间相继掀起的两次波澜壮阔的古文革新运动，使唐宋文苑，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古代散文，也因此而进入了它艺术上最为成熟的阶段。而在唐宋两代涌现的大批优秀作家中最负盛誉的，则是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

“八大家”的名称，来自明代散文家茅坤所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这种认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演变过程。其实，八大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便已经是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而蜚声文坛。北宋末年，邵博在论文时，也将韩、柳、欧、苏并称。其后，南宋的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一书，以为后学学习古文的典范，便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和张耒七家文为范文。至明初，朱右选编《八先生文集》，又在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基础上，去张耒而补入王安石和苏辙，于是便首次有了所谓“八先生”的称号。这一认识发展至明中叶，又因文坛上复古与反复古的角逐而得到了确认。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唐宋派作家一力标举唐宋古文，力图以有规可循的“唐宋模式”来替代无法可依的“秦汉模式”。唐顺之选编《文编》，于唐宋两代，便只录上述八家文章。接着，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问世，

“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唐宋八大家”的称呼因此也得以成为定论，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对于这一提法，清代以后，也有些人持有异议，但从总体上说，它还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过较严格的历史的筛选之后，人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中间因而也就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崛起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相互间又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成为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坚，甚至领袖人物。他们共同为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其次，是他们以自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艺术宝库，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从林林总总的唐宋古文家中，遴选出这八家，并将他们的作品树作唐宋古文创作的丰碑，确实较好地反映了古代散文史上这一重要发展阶段的历史面貌，较充分地展示了古代散文走向艺术上成熟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八大家”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文学成就也有高下。以风格而论，韩文雄奇，柳文峻洁，欧文婉曲，王文劲峭，曾文醇厚，苏轼豪放，老苏恣肆，小苏澹泊，都自成一体。以散文成就而论，韩、柳、欧、苏（轼）最负盛名，其余四家，也各具风采。八家中，除苏洵外，又都能诗，又以韩、柳、欧、苏（轼）、王成就最高。此外，欧阳修和苏轼又是词坛大家，他们的词，在北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八大家”的文论主张与文学创作，是唐宋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产物。尽管除柳、王之外，其余六家都称不上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和社会政治、却又都

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八大家”所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其顶峰开始下滑时期。江河日下，百感苍茫。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们，屡屡力图通过革新朝政来扭转局面，维护那业已日过中天的封建秩序。柳宗元积极参与的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革新，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便都是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变革运动。“八大家”的立场与政见尽管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些社会政治斗争的风暴里。斗争的残酷以及变革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乃至人生悲剧。他们的诗文创作，也便都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知人论世”，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各自的生平阅历、性格气质乃至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从来都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作家年谱与传记的撰写，因而也历来都为学术界所重视，“八大家”的研究也是这样。从清末梁启超著《王安石评传》，到一些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中如《韩愈》、《柳宗元》等传记的出版，进而到近十余年中出现的一些“八大家”评传，都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缺乏比较全面的、统一的规划，“八大家”传记的撰写，总体上仍显得不那么均衡，或者体例不一，或者侧重点不同，或者具有较浓的学术考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雅俗共赏的《唐宋八大家列传》丛书的出版，也便有了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意义。读者将“八大家”列传相互比照进行阅读，或许会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并永远铭记他们为华夏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王琦珍

1997年4月6日

前 言

韩柳文章李杜诗

——柳宗元的文学和思想

柳宗元是唐代的古文大家，他和韩愈生在同一个时代，有如双峰并峙。而艺术风格，各具特色，千载常新。其所以致此，决非偶然。这里专论柳宗元。

柳宗元河东人，出生于世宦家庭。从高祖奭，官至中书令，为许敬宗所构陷，坐大逆伏诛。父镇，曾官御史，因触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窦参，被免职。奭、镇都刚正不阿，这给了宗元很大影响。宗元先后中进士及博学宏词，历官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掌权，实行新政，宗元任礼部侍郎，参与其事。首先罢免害民最甚的京兆尹李实。其他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盐铁使“月进”，一切停罢，又放出后宫三百人。这些措施，都应该肯定。但遭到权贵们如裴均、严绶、郑絪、卫次公及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的反对，宪宗一即位，都被贬逐。宗元谪永州司马，十年后迁柳州刺史，死任上，年四十七。

柳宗元不承认自己参与新政是有罪的。他在为王叔文母亲写的志文里称叔文“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汙谗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其功勋之大如此，那末他自己又何罪之有？他在《惩咎赋》里写道：“曩予志之脩蹇兮，今何为

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不混同于世，这是他得罪的根本原因。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兮，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以下列举实例，隐然引以自况。又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里，把他自己和吕温连在一起说：“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在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雷动风驱。良辰不偶，卒与祸俱。”这更为他的无罪贬逐大鸣不平。

柳宗元在政治上是失败了，这是不幸，但玉成他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又是大幸。他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经过不断的努力，又以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即志在“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成就如此卓卓。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所说：假使“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柳宗元的古文有其独具的特色。由于他遭贬逐，居下位，多与社会现实相接触，许多不合理现象都在他的笔下被揭露出来。最有名的是《三戒》，表面是写麋、驴、鼠，它们或“依势以干非其类”，或“出技以怒强”，或“窃时以肆暴”，俱“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卒迫于祸”。其实是写与之相类似的三种人，讽刺是深刻的。再则有《螾蝓传》，写螾蝓贪得无厌，负荷过重，力不胜而坠地死。这也是借物讽人，故文章最后说：“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生，不知为己累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

柳宗元的古文最具特色的是山水游记，它是继《水经注》

之后模山范水的杰作。而他把自己渗了进去，则为他所独创，前无古人。他观察精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所以穷尽色相，物无遁形。《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成为物我一体，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道：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佴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真能写出难状之景，景变笔随之以变，又赋鱼以人性，可谓妙绝。《钴姆潭记》写道：

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之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深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予以见天之高，地之迥，孰使予虽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这是借游览山水以排遣忧愁。他之谪居穷荒是很不乐意的。《钴姆潭西小丘记》写道：

以兹丘之胜，致之沔镐鄠杜之间，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这是以小丘的有遭，反衬自己的无遭，寓生不逢辰之叹。《小石城山记》写道：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这里也有宗元的影子，他认为自己贬逐到永州，是莫大的冤屈。我们读其文，便知其人，为之歔歔不置。

柳宗元的世界观比较进步，具有一定的唯物论思想。他不信天命，重人事。天命论者以为天主宰万物，能加祸福于人，所谓人君受命于天，这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思想，达到稳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宗元的《贞符》，则谓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这强调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主张行仁政，行仁政必须尚贤，唯才是用，所以反对世袭。他的《封建论》正是阐明这个道理。春秋卫石碣提出“六逆”之说，宗元认为其中的“贱妨贵，远间亲，新旧”，不当视为逆，指出：“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亦文矣。”人民的力量表现在“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因而产生了民本思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里，说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为官吏者对人民要轻徭薄赋，反对苛敛，使人民无以为生。他的《捕蛇者说》，揭露赋敛之毒，最为深刻：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

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其为祸之烈，诚如在文章末尾所引孔子的话“苛政猛于虎”了。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是道文并重，而它们的位置则道居首而文次之。他说：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以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道假辞而明，……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答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文以明道，一主一从，观于此较然可知。他又说：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缺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

则二者之相须又明矣。

柳宗元之所谓道，其基本观点是指儒道。他说：“取道之原”，是本之《书》、《诗》、《礼》、《春秋》，（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些都是儒家的经典。又说：“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子》，皆经言。”（《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孔子说为政以德，孟子说行仁政，民贵君轻，这些光辉思想，为宗元所继承，在他的文章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柳宗元对文章用功最深，成就最高。韩愈说他在谪贬中，

“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他自己说：“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的，是参之谷梁氏、孟、荀、庄周、《离骚》、太史。（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弱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西汉文类序》）从这里可见他之所以说东汉既衰，魏晋以降弱靡，由于它们是骈文的滥觞。他最不喜“抽黄对白”，“骈四俚六”（《乞巧文》）的骈文。韩愈提倡古文，宗元作桴鼓之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转变文风上立了大功。二人之间，互相推重。韩愈于宗元则谓：“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引）宗元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胡守仁

（江西师大中文系教授）

引 言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冬末。在遥远的北国，早就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了。南方虽说相对地要温暖一些，但也是彤云密布，阴冷得出奇。大概是正当洞庭湖和长江的交汇点上吧。湖南岳阳一带的湖面上，更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然而，正是在这凛冽的北风和汹涌的波涛中，从遥远的天边驶来了一只带篷的帆船，渐渐地靠近了岳阳码头。

就在这艘普通的帆船上，搭乘着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以及他的家小：母亲卢氏夫人、幼女和娘、堂弟柳宗直和表弟卢遵。和人们通常所见的赴任官员不一样，他没有赫赫羽仪、猎猎旌帜，没有高悬的红灯和迎送的官员。一切是那样普通，一切是那样平常。

岳阳历来是天下形胜之地。只就当朝以来，李白、杜甫、孟浩然等著名诗人，便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是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等诗句，更被公认为是千古绝唱。而洞庭湖中的君山，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有着许多极为美丽神奇的传说，据说，君山下有龙宫，还有地道直达东海。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路过此处，无不登临俯仰，长歌抒怀。

然而，柳宗元没有。他九月离开京师，迤逦南来，至今还沉浸在强烈的愤怒和悲怆之中。他心心念念想着的只是历史上那位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爱国诗人屈原。半年前，他积极投身

于王叔文、王伾倡导的政治革新运动中，希望为安史之乱以后每况愈下的唐王朝重振雄风，开创一个中兴局面。然而，历史似乎注定了这场政治革新最后要归于流产似的，正当改革进入关键时期，领导者之一的王叔文却因故离开朝廷，而支持他们的顺宗偏偏又是位早已中风、抱病即位的皇帝，宦官集团乘机联合朝廷内外的保守势力，胁迫顺宗退位，将政权交给了对改革派早已恨之入骨的太子李纯。李纯即位，史称宪宗。他一上台，就极其严厉地打击革新派，将王叔文、王伾贬往外地，同贬的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制造了唐代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其实，柳宗元初贬时原本是邵州刺史。邵州即现在的湖南邵阳市，地理位置还比较好，官阶也与朝中职务差不多。但保守势力还觉得惩罚不够，大概是为了解恨吧，在他们纷纷离京赴任的途中，朝中执掌大权的官僚们决定加重惩罚，将柳宗元等八人全部改贬为偏远州郡的司马，这就带有明显的降职降级流放处分的意味了。柳宗元还没过长江，就接到改贬永州司马的诏令。永州即现在湖南的零陵，是接近广西的偏远山区，历来被视作蛮荒之地。但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柳宗元除了愤懑之外，已经是毫无自我保护和抗争能力了，他只好带着六十七岁的老母和不满五岁的幼女，穿过洞庭湖滔天的巨浪奔赴永州贬所。开始了他“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活。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恰恰正是这一变故，造成了柳宗元极其突出的文学成就，使他得以跨入“唐宋八大古文家”的行列。

目 录

前 言	韩柳文章李杜诗	
	——柳宗元的文学和思想	(1)
引 言		(7)
第一章	盛时一去贵反贱	
	——家世与童、少年	(1)
第二章	许国不复为身谋	
	——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	(20)
第三章	苍鹰上击翻曙光	
	——投身政治改革	(40)
第四章	风波一跌逝万里	
	——初贬永州	(59)
第五章	种漆南园待成器	
	——待罪南荒	(86)
第六章	事业无成耻艺成	
	——永州十年的文学创作	(112)

第七章	谁料翻为岭外行	
	——柳州的贬谪生活	(148)
尾 声	圣神无迹示教功	
	——柳宗元崇佛略论	(183)

第一章

盛时一去贵反贱

——家世与童、少年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为唐代的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柳宗元出生在京城长安。

柳氏得姓，据说始于柳下惠。柳下惠即展禽，名获，春秋时代鲁僖公时人，因食邑于柳下，死后其妻又给他私谥为“惠”，所以称为柳下惠。在鲁国人的心目中，柳下惠是位有名的贤士，同时又是智慧的化身。关于他，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很美丽的故事。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六三四年），齐国君主齐孝公出兵侵犯鲁国北部边境。当时，鲁国国内正遭受了灾害，府库空虚，情势十分危急。面对压境的强敌，僖公派柳下惠的弟弟展喜，以劳军的名义去与齐军交涉，并交待他，让他出发前先去请教柳下惠，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柳下惠给他面授机宜后，展喜信心十足地出境去见齐孝公。不可一世的齐侯劈头就问：